

# 三复集

赵树理

225



三 復 集

卷 之 一

三 復 集  
卷 之 一

# 三 复 集

赵 树 理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二 年 · 北 京

三 复 集

书号1494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95,000 开本850×1168 $\frac{1}{32}$  印张4 $\frac{13}{16}$  插页2

1960年7月北京第1版 1962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定价(1)0.50元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目 次

|                    |    |
|--------------------|----|
| 下乡杂忆.....          | 1  |
| 新食堂里忆故人.....       | 5  |
| 万里同心.....          | 9  |
| 谈六亿.....           | 12 |
| 一张临别的照片.....       | 16 |
| 群众创作的真繁荣.....      | 21 |
| 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    | 26 |
| 从曲艺中吸取养料.....      | 39 |
| 彻底面向群众.....        | 50 |
| 我爱相声《水兵破迷信》.....   | 53 |
| 我们要在思想上跃进.....     | 56 |
| 和工人习作者谈写作.....     | 59 |
| 要挖断可右之根.....       | 71 |
| “小戏”小谈.....        | 74 |
| 和青年作者谈创作.....      | 77 |
| 谈课余和业余的文艺创作问题..... | 85 |
| “才”和“用”.....       | 98 |

|                  |     |
|------------------|-----|
| 願你决心做一个劳动者.....  | 109 |
| “出路”杂谈.....      | 113 |
| 不要这样多的幻想吧? ..... | 120 |
| 青年与创作.....       | 123 |
| 《三里湾》写作前后.....   | 134 |
| 也算經驗.....        | 147 |
| 后記.....          | 150 |

## 下乡杂忆

趁着—一个隆重的节日回忆往事，已經成为人們的习惯。在我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的大庆之前，我想談談我的下乡。巧得很！我下乡的历史也恰好只有十年——因为十年之前我根本生活在乡間，无所谓什么下不下，自从1949年来到我們的首都北京，才把再到乡間去称为下乡。

到了北京之后，我曾担任过一点地方性工作。在这期間，我也曾想就地熟悉一些地方情况，把北京作为我新的根据地，可是略一試驗，便觉得写作上的根据地不那么容易創造。不易办到的事，多加努力自然也可以成功，不过我觉着放棄一个自己已經熟悉的地方，再去熟悉一个不太容易熟悉的地方，事倍功半，无大必要，因此才又决定下乡。

我們政治文化中心的首都固然可爱，但粮棉油料产地的农村也是可爱的。假如要問二者相較哪方面更可爱，我以为这和問荷花与菊花哪个更可爱一样——不同类的事物不能作比較。一个写作者不應該是兴趣主义者，可是一个写作者总得对自己熟悉群众生活的根据地永远保持着飽滿的兴趣。即从物质享受方面來說，城市和农村也是各有千秋的。例如农民晚上在打麦場上开会：坐在打过麦子的麦秸上。这种坐位

使人另有一种舒服感，要换成北京工人俱乐部的椅子，恐怕还要差一点——自然要把北京工人俱乐部铺上麦秸，就不如椅子合适，不同类的事物不能互换。再如城郊农民头一天把青玉米扳下来，第二天到城里煮着卖，要是又卖到一个农民手里的话，这个农民啃第一口就知道这玉米是隔了夜的。可是城市人很难吃到当天扳下来的玉米，所以不易尝出新玉米的鲜味。城市人吃饭自然也吃得很细致，但是吃新鲜农产品的机会却少于农村。我从小曾锻炼了一个消化小米的胃口和两条爬山的腿，这两种生理的性能，我将永远不让它退化。也许有人以为将来物质条件提高了，再用不着吃小米和爬山，可我想即使是那样，有爬山的习惯，吃炒小米捞饭的嗜好，也没有什么不好。

田园风趣固然使我留恋，但更值得留恋的还是和我们长期共过事的人。太行山是老解放区。这里的农民，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和我们共同抵抗过国外、国内的敌人，共同消灭过地主阶级的剥削制度。我个人在这些时候曾和他们共过事，又曾写过他们这些斗争，所以才把这地方作为我熟悉群众生活的根据地。当我在1951年重新到了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机关驻扎过的一个山村的时候，庄稼长得还像当年那样青绿，乡土饭吃起来还是那样的乡土风味，只是人们的精神要比以往活跃得多——因为我们有了中央政府，老乡们都以胜利者的姿态来欢迎我这个回来的老熟人。

我曾在其他地方说过，我个人熟悉农村生活的方法就是和人“共事”。毛主席告诉我们说，“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

群众的先生”。我觉着在共事中間，既好做學生，又好做先生。毛主席要我們到群众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这好多“一切”，看来好像千头万緒，不易面面俱到，其实只要和群众长期共事，即使想叫哪一面不到也不行，现实的社会本来就是由千头万緒組成的。我在这十年下乡生活中，不过是和以前共过事的人們繼續共事，不同的只是十年以前共的是民族、民主革命之事，十年以来共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之事而已。

和这种老战友們共事有个痛快勁儿，那就是他們在长期战争环境中养成了些不計个人得失的忘我精神。例如农业合作化在全国是1953年才开始大搞的，而在这个地区則是1951年試驗、1952年推广的；越乡越县互相支援兴修水利在全国是在1958年大跃进中的事，而在这个地区則是从1956年就开始的。他們虽然都是不脱离生产的农民，但也是些革命的浪漫主义者。他們遇上了新鮮事物，不但顾虑不多，并且兴趣頗大。当1947年刘邓大军从太行山南下大别山区作开辟工作的时候，曾組織过他們几万民工随軍参战达一年之久。在这一年中間，他們曾拿着扁担押解过俘虏，有的干脆就留在那里作了地方工作，直到現在談起这段事来他們还认为是很有趣的一段生活。大跃进的勁头，在他們看来只是这种革命精神的繼續，一点也不生疏。

十年間，我又曾和这些老战友共过好多事。我們所共的事是：从互助組一直共到公社化，从栽接苹果树一直共到苹

果上市場，从扫盲缺教員一直共到乡乡有中学，从两条腿爬山、交通員送信一直共到县县通汽車、村村安电话。和他們共的事多一点，写的作品就少一点，不过我觉着这也不是什么賠本的事——能在实际工作中贡献一点力量，所产生的社会价值不会比作品小，同时，凡是自己认真作过的事，过一个时期大部分都还会反映在自己的作品中，而且或者还会反映得更准确一点。我将长期地这样做下去。

1959年9月23日

## 新食堂里忆故人

我的故乡，在太行山南端的西边。我不但在那地方生长、上学，而且直到全国大解放以前，都在那个山区工作。因为有这样的历史关系，我在解放以后虽然离开了那里，但一有机会，总想回去看看。

这个地区，远在1937年就成了抗日战争的老根据地；解放以后，自然也和其他老根据地一样，虽然不能说事事走在前边，至少也可以说事事不甘落后。我每次回去，总能碰到一些新鲜的事物。我所写的小说，大部分取材于这个地区。

去年(1958年)冬天，我又回到我的故乡去。去年是个大跃进年，新鲜事要比往常多。首先使我感到新鲜的，是公社化以后新建的食堂。这是一列座北向南的新房子，西头是厨房，东头是饭厅。厨房里有井——是把一眼旧井包在这新房里的，用水不要到外边挑；灶火的添煤口和出灰渣的坑都在墙外，里边用火不见火，没有一点灰尘。饭厅里摆着两列方桌，每张桌周围有四条板凳；中间留着相当宽的路，烧着两个地炉。还探不着桌子的孩子们，在吃饭时候都爱围着火炉子吃。

当我在这食堂吃第一顿饭的时候，便先向大队干部发表我的感想。我说我首先感觉到的是食堂修得很得劲，但在建立

公社之初，以一个七十来户的力量来修建这样一列房子，未免有些鋪張浪費。队干部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我的话，附近几张桌子上的人就一齐笑了。有人提出来让我估一下費用。我不太在行，一时估不出，正在估計中，有人劝我說干脆不要費那个事。后来大家才告訴我說，修这房子不但沒有請什么匠人，购什么材料，而且正規的劳动日也沒有占用好多，大部分是社員們在下工之后抬石头、搗土坯，用业余时间搞起来的，而且只突击了十来天就落成了；材料也是大家拼湊的。劳动人民創造起什么来，有时候真像变戏法。

看到这样个花錢不多、质量不坏的食堂，固然使我很高兴，可是一看到食堂的地基，就慢慢联想起好多故人来：

这地方叫“南院門口”。南院的前院里住着我的一户本家，原是弟兄三个，論年岁都和我父亲的年紀差不多，只是按輩数和我是平輩。老大哥名叫喜贵，当年因为沒有地种，在安澤县种山地，沒有結过婚就死到那里了。老三名叫各輪，青年时期要算当地的劳动英雄，后来也因为沒有好地种，坏地产量太少，无心受苦，改学梁上君子，結果被族里人打了个半死埋了。他的遭遇和魯迅先生写的阿Q有点相像，当年我也曾想給他写“正傳”，后来终于沒有写成。这两位老兄，就是这样被貧困夺去了生命，連个后代也沒有留下。

食堂的东头，叫“窰头上”。这院从前也住着弟兄两个。他們也和我父亲的年岁相仿，姓呂，老大名叫拴成，我称伯伯；老二名叫随成，我称叔叔。这两位，除了住的房子以外，再没有什么产业。那位老拴成伯伯是伤寒病死的，死后留下两个孩

子，大的在一个災荒年餓死了，二的一直住在舅家，直到土改时候才回来，現在是一位小隊長。隨成叔也和我那位喜貴哥一樣，沒有結過婚，被一塊中了蛇毒的死牛肉給吃死了。

食堂的南邊有一戶姓馮的，父子兩代都沒有一壠地。孩子名叫福歸，我稱哥哥，也是在外討飯被餓死的。我寫的小說《福貴》，有一部分就是他的生活。

福歸哥的房背後，有個院子叫“東頭院”，住着一戶姓呂的，弟兄四個，我對他們其中兩個稱伯伯，兩個稱叔叔。他們都會木工，但只有幾畝很壞的地。在我的家鄉一帶，當工匠差不多是副業，完全靠它生活是困難的。他們四位，只有老四在三十歲以後才結了婚，三位當哥哥的都沒有結過婚（老二到五六十歲也找過個老伴）。他們都愛好民間音樂，八音會的樂器長期存在他們家裏。我愛打打鑼鼓大半也是在他們家學會的。現在他們都去世了，只老四留下一個孩子。老四叫六牛。這位老叔叔也是災荒年逃荒出去死在外邊的。他的孩子已經在外邊落了戶。

東頭院的東北，當年有一株大核桃樹，樹下有两孔古石窑，連門窗都沒有。不過這兩孔石窑庇護的人可真不少——河南遭了水災逃荒到這村里的人，開始差不多都在這里住過，有的短時期找不到住處，還有住過幾年的。我寫《李有才板話》中的“老字輩”人，好多取材於這里。我們村里當年逃荒出去的人，到外邊開始當“老字輩”人的時候，未必都能碰到這樣好的住處。

.....

这些故人，数起来要上百（連邻近村里的数要够好几百）。这些熟悉的善良的面孔，东逃西散，死的死亡，大多连个后人也没有留下。假如他们不是被旧社会的贫穷和灾荒逼死而能活到现在，一定有许多是领导干部或者劳动英雄，这时候一定都欢聚在这个新食堂吃饭。

我因为数算这些故人，饭吃得慢了一点，没有注意到大人们都已经吃过饭干活去了，只剩下围着火炉的一群学龄以下的儿童。这伙小宝贝们也不认生，见大人走了，有几个围着我，问我从哪里来的，其中有个叫出我的名字来（可能是大人指着悄悄跟他说过的）。我以两只手在他们头上摸来摸去，又指着每个问他们的名字。嘴快的指着每一个介绍给我说他叫小什么，他叫小什么，可是我连一个也没有记住，每一个名字前边只记了个“小”字。我觉着这也可以说是些“小字辈”人物吧，不过比我在《李有才板话》中写的那些“小字辈”人物幸福多了。他们将永远不会再懂得什么叫“逃荒”。

1959年5月

## 万里同心

——答瓦連津·奧維奇金

瓦連津·奧維奇金同志：

感謝你對我們這些下鄉的作家們的關心！這種關心，表明我們生長在社會主義國度里的人民脈搏的一致——用我們中國一句老話說，叫做“心心相印”。我們彼此間，可以說是超出個人範圍的“知心好友”。

作家下鄉參加勞動這件事的重要性，在中國說來，要比你所估計的更大一些。蘇聯的人民已經有了四十年的社會主義生活史，因而有好多作家是真正從做了主人的勞動人民家庭中生長出來的。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還只在開始時期，翻了身的勞動人民的孩子們還沒有長大，能動手寫作的人，絕大多數雖然也都願意為勞動人民服務——其中有的已經服務多年——不過差不多都不是從勞動人民家里長大的，因而對了解勞動人民來說，要比你們的作家們差一個原來的基礎。你是知道的：用“文藝”來為社會服務多憑的是直接材料，沒有哪一方面的觀感，便不能描繪哪一方面的事物；不了解什么人，便不能寫或者寫不好什么人。我們中間，也曾有人提過“不寫勞動人民寫別的人行不行”這個問題。自然不寫勞動人民也不

是絕對寫不成作品，只是在勞動人民作了主人的社會主義國家里，一個號稱作家的人，避開這些最大多數的社會主人不去寫，究竟能避多久呢？在舊的文藝作品中，我們的勞動人民出不了場或占不了正位，難道在勞動人民翻了身之後，我們的作家們還可以不讓他們在作品中出場或不讓他們占正位嗎？自然誰也不能說可以如此。不寫不行，要寫不摸底，其結果會有兩個：一個是寫不好瞎寫，再一個是到勞動中鍛煉。我們不願意瞎寫，所以就非鍛煉不可了。

至於你所提到的如何保證創作時間問題，在我們這裡也想了一些辦法。我們下鄉的人，在鄉下是以各種身份參與農村生活的——有的當縣里的基點工作幹部，有的直接當鄉干、社干，有的仍以協助工作的身份隨時自選重點參加工作……農村的領導者和同事們對作家的生活也都諒解，因而在安排崗位的時候，差不多就給作家們留着機動的余地。不過，作這樣的安排，還不是把我們這些下鄉的作家看作為無足輕重的人，而是以為有了我們會把工作搞得更好些，我們走了也不會使某一部分工作停頓。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既不會因寫作而損害農村工作，也不會因放不下農村工作而停止寫作。自然每個人在任何一項工作中都有他一定的作用，突然加一個或去一個也不能是一點影響也沒有的，只是每一項工作都有它自己的段落，在農村工作特殊緊張的段落中，作家自己也不會想到馬上要退出工作而進行寫作；等到這個緊張階段過去了而另一個緊張階段還沒有到來的時候，抽出一個人去寫作，對工作影響不會太大。

为了感谢你对我們的关心，我也把我們这点简单的情况告訴你。望你今后仍對我們多加指点。

祝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心情愉快！

1958年5月24日